

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及其研究概况

曹嘉懿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内蒙古地区现存 9 座辽代佛塔。本文在建筑史分期基础上, 概括总结了不同时期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及特点。自 20 世纪初由日本学者调查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开始, 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研究进入了资料积累的基础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 伴随着第一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和文物工作的开展, 基础资料日益丰富。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随着数座辽代佛塔得到维修和勘察, 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进入了科学研究阶段, 前期的研究成果以古建筑勘察测绘为主。90 年代以后, 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古建筑和考古学领域, 逐渐发展到美术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阶段。

关键词: 内蒙古地区; 辽代; 佛塔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一、内蒙古地区现存辽代佛塔概况

(一) 内蒙古现存辽代佛塔的分布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重要一支。公元 907 年, 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公元 916 年, 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 国号“契丹”, 后称“辽”, 建元“神册”, 至公元 1125 年, 辽为宋、金联军所灭, 历时 219 年, 传 9 帝。辽虽为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 但其文化内涵丰富, 独树一帜。辽代早期的宗教信仰以萨满教为主, 至辽代中期, 随着疆域逐渐扩大, 多民族杂居, 受汉人影响, 佛教也日渐兴盛。辽代崇佛,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 “兴王寺, 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 自潞州迴, 入幽州幸大悲阁, 指此像曰: ‘我梦神人令送石郎中为中国帝, 即此也。’因移木叶山, 建庙, 春秋告赛, 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 乃符传箭于诸部。”^[1]可见自太宗时起, “白衣观音”成为“家神”,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得到契丹皇室认同。由于佛教兴起, 辽代疆域内也开始大兴土木, 修建佛寺建筑。

辽有五京, 其中辽中京、上京以及西京的北部地区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在这些地区, 分布着现存的 9 座辽代佛塔, 其中 3 座属辽代上京道, 有上京南塔、上

京北塔和庆州白塔；5座属于中京道，有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敖汉五十家子塔、塔子沟白塔和敖汉武安州塔；1座属于西京道，为万部华严经塔。

（二）内蒙古现存辽代佛塔的基本信息

内蒙古地区的9座辽代佛塔

序号	名称	位置	相关文献记载或碑铭记载	建造年代	类型
1	上京南塔	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	林东镇塔子沟村火葬墓中骨灰匣盖的墨书题记中的开悟寺。	不详	八角七层密檐式
2	上京北塔	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	林东镇北山砖瓦厂火葬墓中灰匣子的匣盖墨书中的宝积寺。	不详	六角五层密檐式
3	庆州白塔 (释迦佛舍利塔)	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	《释迦佛舍利塔记》，《辽代石刻文编》兴宗编； 《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庆州五层塔室碑》、《庆州圆首建塔碑》，《辽代石刻文续编》。	重熙十八年 (公元1049年)	七角八层楼阁式
4	中京大明塔(感圣寺佛舍利塔)	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	《元一统志》：“感圣寺在中京大定府丰实坊，有舍利塔，辽统和四年(公元987年建)。	或重熙四年 (公元1035年)	八角十三层密檐式
5	中京半截塔	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	清宁三年纪年砖	清宁三年 (公元1057年)	
6	敖汉五十家子塔	内蒙古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	无	不详	八角十三层密檐式
7	塔子沟白塔(静安寺佛牙舍利塔)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大营子村	《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墓志》，《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	应建于咸雍六年 (1070)至大安七年 (1091)之间	三层密檐
8	敖汉武安州塔	内蒙古敖汉旗丰收乡	无	不详	八角十三层密檐式

9	万部华严 经塔	内蒙古呼 和浩特东 郊白塔村	塔内第一层内发现的六块金代 碑铭	不详	八角七层楼阁 式
---	------------	----------------------	---------------------	----	-------------

上京南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南 8 公里的土龙山上。上京南塔为八角七层密檐式砖塔，1999 年加固维修，维修后高 25.47 米。在上京南塔东南 50 米处，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据 1972 年林东镇塔子沟村发现火葬墓中骨灰匣的墨书“天庆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开悟寺前开龙别贮沙门积行灰衬”^[2]可知，上京南塔东南的建筑基址应该为辽代开悟寺，上京南塔位于开悟寺中，但《辽史》中并没有关于开悟寺的记载。根据墨书题记，开悟寺应建于天庆元年（公元 1111 年），上京南塔修建年代不详。

上京北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林东镇，辽上京遗址北 2 公里的山岗上，与南塔相对。上京北塔为六角五层密檐式砖塔，高约 15 米。经 1980、1990 年两次维修。上京北塔附近早年存在着大型建筑基址，地表散布着辽代琉璃瓦残片的建筑构件。据 1967 年在林东镇北山砖瓦厂发现一座小型火葬墓中的灰匣子，匣盖墨书“大康八年十月廿日三更宝积寺首坐沙门善忍灰衬匣子”，推测该建筑基址为辽代宝积寺，北塔为宝积寺内的佛塔。^[3]同开悟寺一样，宝积寺在《辽史》中并无记载。

庆州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辽庆州城西北部，为七角八层楼阁式砖木混合结构，高 73.27 米。庆州白塔于 1988-1992 年间进行维修。塔内发现的砖刻塔记铭，记载了该塔是兴宗生母章圣皇太后供奉，于重熙十八年（公元 1049 年）竣工。根据铭文可知该塔原名“释迦佛舍利塔”，但《辽史》中没有关于该塔的记载。塔内发现了大量遗物，如佛像、菩萨像、舍利塔等，对于了解辽代佛教具有重要意义。

中京大明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内。大明塔又称“感圣寺佛舍利塔”，^[4]位于辽中京丰实坊感圣寺内，在大明塔附近发现有高出地面的龟首形台基，推测为感圣寺遗址。大明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高 80.22 米。有记载的修复工作是在清咸丰四年（公元 1854 年）。1983 年又重修加固。其修建年代应在辽兴宗重熙四年（公元 1035 年）^[5]，但也存在着不同观点。

中京半截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外西南角。由于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 1290 年）间的大地震而倒塌损毁，故称半截塔。^[6]台基呈八

角形，保存在地表上得有第一层塔身和其上的三级台阶。因发现有“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字样的青砖而确认该塔为辽代佛塔。1984年曾进行加固维修。

敖汉五十家子塔，元代时称“万寿白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玛尼乡五十家子古城中部偏北。^[7]敖汉五十家子古城始建于辽代，属降圣州，元代属宁昌路。该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高约34米，初建于辽，后经元、明修补增筑。项春松称其为“龙化州塔”，并认为其建筑年代在辽末金初。^[8]

塔子沟白塔，又名静安寺佛牙舍利塔。静安寺塔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美丽河镇大营子村北的孤峰山上。该塔为辽代静安寺内的佛塔。在静安寺遗址附近发现了耶律昌允及其夫人兰陵郡夫人萧氏合葬墓。根据出土的《耶律昌允妻兰陵郡夫人萧氏墓志》并结合《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的内容，推断出建造静安寺起源及其建造年代。静安寺塔有三层密檐结构，塔刹已经不存。该塔于1996年确立为第三批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

敖汉武安州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丰收乡白塔子村附近，武安州故城内，为密檐式八角空心砖塔，塔顶及塔刹部分残损缺失，天宫裸露。^[10]塔北侧发现了一处建筑基址，并且在地表发现了大量建筑构件，推测为寺庙遗址。该塔位于寺庙遗址内。塔南侧为辽代武安州城遗址。武安州属中京道，《辽史》卷三十九《地理志三》中京道中记载：“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坞新城。”^[11]项春松先生又称其为杏坞新城舍利塔。^[12]

万部华严经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该塔是辽代西京道丰州城内寺院中的佛塔，如今寺院建筑已经不见，地表只留一塔。万部华严经塔为八角七层楼阁式，高61.45米，可能为藏经所建。1986年10月修复竣工。其建造年代“应略早于广济寺塔的清宁三年，可以确定应属第一期，而不会早至圣宗时期，推测该塔可能属兴宗时期建造，即一期后段”。^[13]金、元、明、清对该塔都有增补修筑，因而塔内留有汉文、八思巴文、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等题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调查与研究历程

根据研究测量手段和学科参与等特点，辽代佛塔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较早进行辽代佛塔研究的是鸟居龙藏，其后许多日本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其中关野贞对于辽代佛塔的研究比较全面透彻，弥补了许多日本学者的不足。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阶段，中国学者

开始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研究辽代佛塔，但还是以资料积累为主。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是辽代佛塔研究的科学调查阶段。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更加关注辽代佛塔，研究方向也逐渐向多学科领域发展。

（一）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的调查

近代中国，由于历史背景、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环境等种种原因，大批外国学者来到中国，率先研究中国古代的遗迹遗物。对辽代佛塔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的日本学者，这批学者中即有考古学者，也有建筑学者。当时曾到达中国研究辽代佛塔以及辽代建筑的，有鸟居龙藏、常盘大定、伊东忠太、关野贞、竹鸟卓一、村田治郎、神尾式春等人。

鸟居龙藏是从考古学角度对满洲辽西东蒙古地区的古遗迹进行调查研究。他走访踏查了东蒙古地区，并将结果记录发表在《满蒙古迹考》第三十一章《辽代之塔与其信仰》中，鸟居龙藏指出辽上京的佛塔“稍完全只有一座”以及“辽之行宫，有一完全砖塔。因涂白色，故一名白塔子”。^[14]这两座塔分别是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鸟居龙藏针对在上京南塔采集到的大日如来像和天人象提出了一些观点。他认为大日如来像的出现，代表着密教在辽代时已经传入了蒙古地区。辽上京南塔发现的天人像肩际生有羽翼，中国本土和日本的天人像则没有羽翼，仅饰薄鳍表示飞天的轻盈姿态，并由此得出，辽上京南塔的天人像受到了印度北部犍陀罗的影响，在辽文化中，已经有了西方文化的渗入。

其余的学者多是从建筑学角度进行研究。伊东忠太和关野贞对于辽代佛塔的研究调查以图像记录为主。伊东忠太和常盘大定都研究过辽代佛塔，但前者并未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进行研究，后者则是因为难以找全其著作而无从得知其是否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进行过研究。关野贞是研究辽代佛塔比较全面的日本学者，他曾经到达过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调查并且拍摄大量图片，对其后期研究中国辽金建筑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村田治郎在其著作《辽代佛塔概说》中列举了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上京南塔、中京大明塔、中京半截塔以及辽宁、北京、河北等地区的辽代佛塔，并且从多个方面对辽代佛塔进行归纳论述。^[15]

（二）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

这一时期的研究逐渐以中国学者为主，以古建筑研究者从建筑学角度分析辽代佛

塔为大宗，但他们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的调查和研究不够普遍。在考古学方面，有学者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进行简单调查记录。

在古建筑学方面，梁思成先生在《图像中国建筑史》^[16]中指出，处于繁丽时期的辽代佛塔开始在外模仿木构建筑。他将这一时期的佛塔分为单层塔和多层塔两种。多层塔中又可以分为仿木构式和无柱式，其中仿木构式包括北宗辽式和南宗宋式。他以应县木塔为北宗辽式佛塔代表，没有具体列举出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实例，只是论述了热河地区辽代佛塔的特点是材料所限导致的出檐较浅。梁思成先生对河北、北京、辽宁等地区的辽代佛塔研究都有涉猎，但对于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则笔墨不多。

刘敦桢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了河北省许多佛塔，并发表了相关调查报告。在1966年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7]中，将楼阁式的砖石塔分为三种类型，辽庆州白塔为第二种类型的代表之一，即“塔全部用砖或石砌造，但塔的外形完全模仿楼阁式木塔”。他认为辽金密檐式佛塔的形式是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延续至明代，但没有以内蒙古地区辽代密檐式佛塔为例。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考古学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研究并不如古建筑学那样系统，研究类文章比较少，有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及其记录报告。汪宇平先生发表于1957年《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18]中提及当时发现的一些辽代佛教遗迹，其中辽代佛塔有巴林左旗上京城内的南塔和北塔；巴林右旗的白塔子；喀喇沁旗的塔子沟；宁城县大名城的大塔和小塔；呼和浩特市白塔村白塔以及土默特旗蟠龙山的残塔等等。汪宇平先生的这篇文章提及了50年代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各种遗物遗迹，对辽代佛塔的描述仅有数语，但是对后来开展的研究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其后有朱希元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呼和浩特市的两座塔》^[19]中对万部华严经塔的地理位置、建筑形制及特点、修建年代等进行了归纳总结与考证。与此同时，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在1959—1960年对辽中京城址开展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了解了辽中京城内的各类建筑的分布以及功能，也对辽中京范围内的佛塔有了初步认识。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

经过20世纪上半叶古建筑学者和考古学者的初步调查和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前期的资料积累阶段进入了科学调查阶段。首先，辽代佛塔的保护和修葺工作普遍集中在这一时期，测绘结果更加准确，勘察数据更加详细。其次是这一阶段辽代佛塔的基础资料日益丰富，推动了其后综合研究的发展。最后，这一阶段

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罗哲文先生在《中国古塔》^[20]中指出,庆州白塔等辽金时期佛塔在塔寺布局虽然变化不大,但是其地位与宋代以前的佛塔相比仍然是下降的。在古塔的类型中,罗哲文先生根据万部华严经塔等砖石结构的楼阁式塔的形象来参考早期楼阁式木塔的形象。他将辽代密檐式佛塔与前代佛塔的不同归纳为三点,内蒙古地区的中京大明塔是这三点变化的代表。

张驭寰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名塔》^[21]一书中,介绍了52座中国古塔,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只有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一例。在《大青山下一名塔》这一小节中,张驭寰先生介绍了该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塔身装饰等基本情况。

姜怀英等学者在《辽中京塔的年代及其结构》^[22]一文中,主要介绍了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遗址内的三座辽金时期的佛塔,即大明塔、小塔和半截塔,其中小塔为金代建筑。文章介绍了大明塔和半截塔的建筑形制、结构和装饰艺术,总结了辽代佛塔建筑的特点,并对中京三座辽金时代佛塔的修建时间提供了参考意见。位于西京丰州故城的万部华严经塔也得到了进一步研究,张汉君先生在《辽万部华严经塔建筑构造及结构规制初探》^[23]中,从万部华严经塔的构造形制、结构和设计构思这三个方面进行剖析,认为万部华严经塔不仅具有同时代辽代佛塔的特点,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风格和特征,其建筑构造和结构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内蒙古考古研究所于1986-1987年对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进行发掘,1991年发表了《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发掘简报》^[24],对塔基的巨大丘状堆积的形成原因和时间、护土砖墙的作用及形成、基座西侧扩出部分与基座是否同时建筑、基座与塔身是否同时建筑等四个问题进行了解答。随着《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25]的发表,辽中京城内各建筑遗址的分布、皇城和汉城的形制、佛寺建筑的特点都有了清楚地认知。张汉君先生和张晓东先生在《释迦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26]对庆州白塔各层塔门券壁、铜镜及塔刹铸铜覆钵体表面和少量刻于塔表造像壁面和外檐铺作等部位的近三十余条题记、题刻进行了研究,说明了庆州白塔的修葺情况。其后,张汉君的《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27],对庆州白塔的营造历史和建筑基本形制和建筑构制特征进行阐述。

20世纪90年代末期前后,内蒙古地区古建筑和考古工作的成果丰硕。

张驭寰先生在《中国塔》^[28]中,从基座、塔身、塔门、塔檐斗拱、塔身装饰、塔刹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辽代佛塔的特点,万部华严经塔和上京南塔为是有一层基座的代

表性辽代佛塔；敖汉武安州塔是塔一二层檐做斗拱的代表性辽代佛塔；庆州白塔和万部华严经塔是每层檐都做斗拱的代表性辽代佛塔。郭黛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29]中介绍了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中京大明塔、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罗哲文先生在《中国名塔大观》^[30]中从地理位置、修建历史、建筑结构特点、塔身装饰以及塔内遗物遗迹等方面，主要介绍了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和半截塔、庆州白塔这几座塔。还有张汉君和先生和张晓东先生的《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拱——兼探辽代仿木砖构斗拱构制的时代特征》^[31]等文章。

项春松先生在其著作《辽代历史与考古》^[32]中，不仅对辽代历史、城址、交通、墓葬和科技文化等进行总结，同时也介绍了辽代宗教和建筑，特别是列举了五京范围内的辽代佛塔62座，其中位于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有9座，与前文中所列表格相同，详细介绍的有5座，分别是庆州白塔、万部华严经塔、中京大明塔、敖汉武安州塔和上京南塔。

1997年邵国田先生的《辽代武安州城址调查》^[33]，将早年的研究调查成果加以总结发表，简要提及了武安州白塔的地理位置和建筑形制，主要对武安州城址的发现和考证以及这一城址的研究价值进行研究。邱瑞中先生在《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34]中，认为庆州白塔中文物安置规矩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内容是吻合的。同时他结合文献史料得出建造该塔的原因是章圣太后既为了祛病免灾又企盼如来的护佑，使其魂灵不受仁德皇后、萧促卜、萧匹敌等五十余臣子冤魂之搅扰。

（四）第四阶段：21世纪以后

从这一阶段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辽代佛塔。辽代佛塔的研究从古建筑学、考古学发展到了美术学、宗教学等多学科领域。古建筑学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有了更加详细深入地研究。考古学根据辽代佛塔内发现的种种遗物分析辽代崇佛政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复原契丹人的社会精神活动。辽代佛塔的造像艺术、浮雕艺术、装饰风格等则由艺术工作者通过美学角度来进行阐述。

2002年4月至2003年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博物馆组成考古队开始对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进行考古发掘，并于2005年发表了《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35]，分析了台基覆土的地层堆积情况并了解了半截塔的形成原因是由地震引起的，通过地宫和堆积内的遗物确定了该塔的年代

为辽代。董新林先生的《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论述》^[36]，简要概括了辽上京南北塔的发现历史。计连成先生在《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37]中，介绍了该塔的历次修筑、塔的外观以及塔身装饰，并对塔刹出土文物情况进行了说明。乌力吉德力根先生的《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释迦佛坐像》^[38]，对塔刹内发现的一尊木雕释迦佛坐像进行了简要描述。此外还有陈术石先生等的《武安州塔的形制及建筑年代考》^[39]《内蒙古宁城大明塔建造年代考》^[40]和张晓东先生的《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41]等论文。前期研究较少的佛塔，如静安寺塔也有了详细的研究报告，佟强先生等就在《静安寺塔和静安寺》^[42]一文中，介绍了静安寺塔的始建年代、形制特征以及静安寺的布局特点等等。

2010年以后，出现了研究辽代佛塔浮雕艺术、装饰艺术的论文。这些文章里都选取了部分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作为代表性佛塔进行论述，如庆州白塔、中京大明塔和万部华严经塔等等。

内蒙古地区的9座辽代佛塔，位于中京道的数量最多，上京道次之。较早得到研究的是上京南塔和庆州白塔，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较多且研究细致的有庆州白塔、中京大明塔和万部华严经塔，国内外学者都对这三座塔的建筑形制、结构特点、出土文物及装饰艺术等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这三座塔基本代表了辽代佛塔建筑的集大成者。

自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通过研究辽代佛塔进而研究中日建筑的异同开始，辽代佛塔逐渐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通过踏查和图片记录的方式研究辽代佛塔。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重点都集中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如伊东忠太。其后虽然有关野贞到达内蒙古东部地区，弥补了这一部分的空白，但日本学者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研究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中国学者主要以古建筑学者研究辽代佛塔为主，并在上一阶段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辽代佛塔，研究重点放在山东、山西、辽宁以及南方地区。这一阶段人们对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认识，大多以测绘勘察和考古发掘为主。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末的科学调查阶段，辽代佛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维修保护工作得到重视，测绘数据和研究成果更加准确丰富，专著类书籍开始详

细介绍内蒙古地区重要的辽代佛塔，专门研究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文章也纷纷出现。

进入 21 世纪以后，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美术、宗教等多学科领域开始研究辽代佛塔。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得到了更加全面细致地研，个别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而鲜为人知的辽代佛塔得到了保护研究。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内蒙古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辽代佛塔，进而了解辽代的崇佛活动、政治制度、文化面貌等等。

辽代佛塔在中国建筑史上影响深远，辽代佛塔建筑处于定性时期。辽承唐制，辽代佛塔既继承了唐五代以来的建筑风格，又对后世的佛塔建筑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内蒙古地域广阔，其辖下各个盟市的地方志和文史资料等文献，有些内容缺失，有些比较分散，所以本文对于那些曾经有过记载但后已损毁或者地表不存辽代佛塔并没有记录。

《辽史》内容简略且存在错误，《地理志》对许多寺庙和佛塔的记载并不详尽。内蒙古地区辽代佛塔以及佛塔内的出土文献资料，对于弥补《辽史》中的不足和纠正其中的错误起着重要作用。内蒙古地区的辽代佛塔在风沙侵蚀和天灾人祸中屹立千年尚存，展现了辽代匠人高超精湛的建筑技巧，并且需要继续加以保护与研究。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辽史•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504.
- [2] 田永金.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00):94-97.
- [3] 田永金.辽上京城址附近佛寺遗址及火葬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00):94-97.
- [4]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347.
- [5] 张晓东.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M].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80.
-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宁城县博物馆.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02):13-26.
- [7] 孙国军,王若芝.赤峰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七批)之八:敖汉旗辽、金、元代宁昌路遗址[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06):277.
- [8]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327.
- [9] 佟强,郎智明,郭雪松.静安寺塔和静安寺[J].草原文物,2013(01):57-64.
- [10] 林林,付兴胜,陈术实.武安州塔形制及建筑年代考[J].草原文物.2014(01):132-137.
- [11] 脱脱等.辽史•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2017.547.
- [12]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357.
- [13] 张晓东.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M].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159.
- [14] 鸟居龙藏著,陈念本译.满蒙古迹考[M].北京：南天书局,1987.163.
- [15] 陈术石,佟强.辽塔相关调查及研究概述[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 2012,(02):22-25.

- [16] 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129.
- [17] 刘敦桢.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220.
- [18] 汪宇平.几年来的内蒙古文物工作[J].文物参考资料.1957,(04):12-17.
- [19] 朱希元.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两座塔[J].文物.1961,(09):62-63.
- [20] 罗哲文.中国古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145,150.
- [21] 张驭寰.中国名塔[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38.
- [22] 姜怀英,杨玉柱.于庚寅.辽中京塔的年代及其结构[J].古建园林技术.1985,(02):32-37.
- [23] 张汉君.辽万部华严经塔建筑构造及结构規制初探[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02):69-74.
- [24] 吉平.辽中京大塔基座覆土发掘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01):58-63.
- [25] 辽上京城址勘察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 [26] 张汉君,张晓东.释迦佛舍利塔历次修葺概述[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02):66-71.
- [27] 张汉君.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营造历史及其建筑构制[J].文物,1994(12):65-72.
- [28] 张驭寰.张驭寰文集.第十四卷.中国塔[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37.
- [29] 郭黛姮.中国古代建筑史(第3卷)宋、辽、金、西夏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470-473.
- [30] 罗哲文,柴福善.中华名塔大观[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02,107,108.
- [31] 张汉君,张晓东.辽代万部华严经塔砖构斗拱——兼探辽代仿木砖构斗拱构制的时代特征[J].古建园林技术,2000(03):3-15.
- [32] 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 [33] 邵国田.辽代武安州城址调查[J].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01):42-59.
- [34] 邱瑞中.辽庆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规矩与建塔缘起考[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6(04):35-40.
- [35] 马凤磊,李义,马景禄,崔伟春.辽中京半截塔台基覆土及地宫发掘简报[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02):13-26.
- [36] 董新林.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论述[J].北方文物,2006(03):23-31.
- [37] 计连成.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J].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02):56-57.
- [38] 乌力吉德力根.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释迦佛坐像[J].北方文物,2003(02):67-116.
- [39] 林林,付兴胜,陈术实.武安州塔形制及建筑年代考[J].草原文物,2014(01):132-137.
- [40] 陈术石,马雪峰,杜津伏.内蒙古宁城大明塔建造年代考[J].古建园林技术,2012(03):56-58.
- [41] 张晓东.辽代砖塔建筑形制初步研究[D].吉林大学,2011.
- [42] 佟强,郎智明,郭雪松.静安寺塔和静安寺[J].草原文物,2013(01):57-64.

On the Buddhist Stupas of the Qitan Dynasty in Inner Mongolia

CAO Jia-y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ere are 9 Qitan Buddhist Towers in Inner Mongolia. Based on the staging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itan Buddhist Towers in Inner Mongolia in different period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Japanese scholars have investigated the Shangjing South Tower and the Qingzhou White Tower. The Qitan Buddhist Towers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has entered the basic stage of data accumul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ong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batch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at all leve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relics, the basic materials period was increasingly enriched. After the 1980s, with the repair and of several Qitan Buddhist Towers, the study of the Qitan Buddhist Towers in Inner Mongolia enter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eriod.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were mainly based on ancient building survey and mapping. After the 1990s, the study of the Qitan Buddhist Towers in Inner Mongolia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field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and archaeology to the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stage of art and religion.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the Qitan Dynasty; Buddhist Stupas

[收稿日期]: 2020-03-22;

[作者简介]: 曹嘉懿 (1997-), 汉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2019 级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辽代历史、辽代考古遗迹。